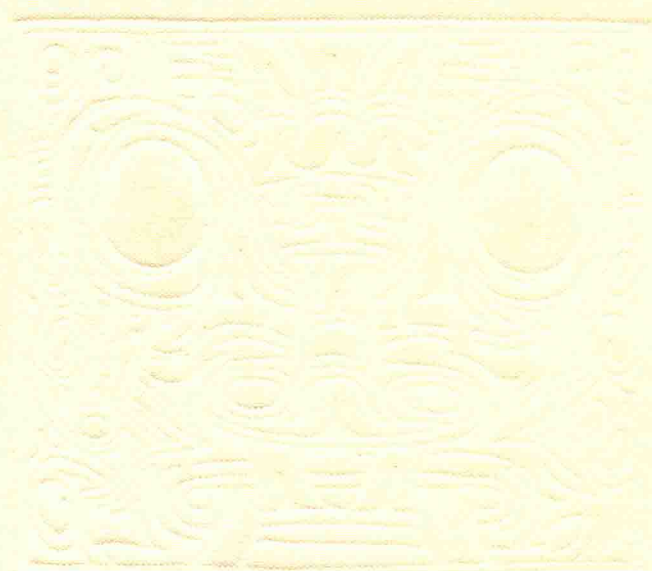


良渚玉器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编著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玉器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良渚玉器 /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03-058663-6

I. ①良… II. ①杭… ②浙… III. ①良渚文化—古玉器—
研究 IV. ①K87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7001 号

责任编辑: 雷 英

责任印制: 肖 兴

装帧设计: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出 版: 科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 编: 100717

发 行: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制: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8 3/4

开 本: 889×1194 1/16

字 数: 135 000

定 价: 3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中国史前玉器以良渚文化最为发达，良渚文化的玉器又以良渚核心地区的反山、瑶山出土者最为集中，数量最多，档次最高，蕴涵的内容也最为复杂。如何解读是一件十分困难而又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解读良渚玉器，离不开对整个良渚遗址的认识。良渚遗址是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巨大群落。古城中心有莫角山等类似宫城的高等级建筑和钟家港的玉器等手工业作坊，周围有反山、瑶山和汇观山等王室祭坛和高等级贵族墓地，还有卞家山船港码头等水运设施。更有塘山长堤和彭公大坝等世界级的超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而这一切又是以极其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基础的。

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已普遍实行犁耕，虽然只是用石犁铧，但总比耒耜的效率要高得多。正是有了犁耕，才可能开辟像茅山那样大面积的稻田，才会有莫角山上那样巨大的粮仓，那里被烧毁的稻谷遗存就有数十万斤，这在中国同一时期的史前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如此发达的农业自然可以养活大量非农业人口，包括各种专业的手工业者、权势阶层和神职人员等，大大促进了职业分工和社会地位的分化。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说：“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对良渚文化来说，这种复杂的专业分工自然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良渚核心地区的高等级建筑和各种巨大工程的建设，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掌握巨大财富和军事力量的贵族集团和他们的首领才能办到。反山、瑶山高等级墓葬所埋葬的应当就是这样的贵族集团。而反山 12 号墓埋葬的死者很可能就是一位王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良渚王。王者行使权力要达到无可争议，还必须依靠神力，让大家相信王权神授。

本书在解读良渚玉器时首先注意到精心刻画而又十分独特的神像，包括完整的神人兽面像和各种简化的形式。它被刻画在除玉璧以外几乎所有个体较大的玉器上，尤以各种形式的玉琮为最。其中的兽面像很可能是良渚玉器中龙首纹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那是一种神圣的徽号，可以称之为良渚文化的神徽。

本书将良渚玉器分为六大类，即葬具上的礼仪用玉，反映神权的琮和琮式玉器，反映王权的钺和权杖，反映财富观念的璧，礼仪服饰用玉和礼仪工具用玉，大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明玉器的使用已经渗透到良渚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良渚古国文明的集中体现。

本书在解读良渚玉器的功能时还特别关注考古发现的情境，以了解某些玉器的组装和配伍关系。例如葬具上的礼仪用玉，如果不与埋葬方式和礼仪联系起来考察，单从器形和纹饰上观察是难以确知其用途的。玉钺和权杖的瑁、徽，以及数以百计的小玉粒，如果不是在考古发掘时注意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单凭其形状和纹饰是无法确知其功用的。良渚玉器的配饰中有一种所谓冠状器，因海盐周家浜发现其卯销在象牙梳上，遂被命名为玉梳背。本书注意及此，但仍保留冠状器的名称。因为冠状器形似神像的冠帽，不仅是实用器，还具有礼制的内涵，这样处理是比较合适的。

本书图版编排十分考究，文字说明也颇具匠心。在以前多种良渚玉器的图录基础上又有显著的提高。对研究良渚玉器和良渚文化都是十分难得的好书，相信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2018 年 7 月 10 日
于北京蓝旗营寓次

序 言 严文明

001 导 读 方向明 / 夏 勇 / 陈明辉

011 I 神像的完形和变化

012 I-1 神 像

050 I-2 龙首纹

055 II 王的葬仪——神的扮演者

056 II-1 头 饰

092 II-2 项 饰

108 II-3 臂 穿

114 II-4 其他饰件

141 III 琮——神权和天地宇宙观

142 III-1 琮

176 III-2 小 琮

188 III-3 琮式锥形器

196 III-4 琮式柱形器

205 IV 璧——财富的象征

213 V 钺和权杖

214 V-1 玉钺杖

234 V-2 豪华权杖

244 V-3 其他权杖

249 VI 玉礼器具

250 VI-1 纺专和织机

256 VI-2 工具组件

260 VI-3 匕匙食具

264 VI-4 木胎髹漆嵌玉器

270 附 录

反山、瑶山主要墓葬平面图及出土玉器线图

291 后 记



导 读

方向明 / 夏 勇 / 陈明辉

1986年反山、1987年瑶山良渚大墓的发现，将良渚文化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庞大的高台土冢和玉器的大量发现，是多工序和大量劳动的结晶，是良渚文化时期社会财产积累水平的反映，根据玉器的种类组合和数量品质彰显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和地位，更是当时社会秩序或权力的象征，成为在更深层次上探索良渚文化的突破口。反山、瑶山所出的玉器，有许多器形为以往发掘或传世古玉所未见，一些至今还是独一无二。按照野外出土的情况，除了琮、璧等少数器种外，可以区分为组装件、穿缀件、镶嵌件三大类，并成功复原了完整的玉钺杖、以璜和成组圆牌为组合的原始组佩、嵌玉漆器等重要器种，为认识玉器在良渚文化时期的总体社会功能提供了重要佐证。神像包括复合形式的神人兽面像和独立的兽面像。完整复合的神人兽面像的发现，首次解决了琮节面图案的来源问题，神像还几乎是良渚玉器的唯一主题，琮、冠状器、三叉形器、玉钺瑁徽的构形都与神像密切相关，几乎所有的玉器都有神像的影子¹。反山、瑶山遗址的发掘，大大丰富和充实了对良渚遗址群的认识。

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良渚遗址群的考古工作持续进行，其中莫角山、汇观山、庙前、塘山、卞家山等遗址的考古发现最为重要。2007年至今，良渚古城、大型水利系统的发现和确认，良渚古城结构布局和格局演变进一步清晰，揭示出东亚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就是这一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²。反山、瑶山的发现在良渚古城考古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为深入探讨良渚王国独特的文明模式，即神权至高无上，以神权为纽带，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文明模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佐证。

一

反山王陵，位于良渚古城内，莫角山宫殿西北角。遗址主体东西长近140米，南北宽约40米，海拔约12米。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反山西部660平方米的发掘中，共清理良渚文化大墓11座，其中以M12为核心的良渚文化早期墓葬9座，良渚文化晚期再次筑高土冢后残存墓葬2座。根据随葬陶器形制和玉器形态特征，结合高台底部测年数据，反山王陵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沿用至良渚文化晚期。

早期9座大墓共出土随葬品1200余件（组），其中陶器36件，有鼎、甑、豆、罐、过滤器、大口缸等；石器53件，均为石钺；玉器1100余件（组），有琮、璧、钺、柱形器、环璧、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饰、璜、带钩、形态不一的管、珠和鸟、鱼、龟、蝉等二十余种，还有大量漆器上的镶嵌玉片、玉粒，以及象牙器和鲨鱼齿等，是已知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雕琢最精美的一处高等级墓地。反山9座墓葬布列有序，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底筑有棺床，多数可辨棺槨葬具痕迹。各墓随葬品丰厚，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执笔：牟永抗），《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18、119页。

2. 刘斌、王宁远、陈明辉、朱叶菲：《良渚：神王之国》，《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

多者达数百件。其中 M12、M14、M16、M17、M20 随葬玉钺，并有玉琮 1 ~ 6 件；M22、M23 以随葬玉璜串饰和成组圆牌为特点。前者墓主人可能为男性，后者可能为女性。

M12 位居中心位置，出土玉器的数量、品质、种类、雕工俱佳，是反山王陵的核心，墓主人可能是良渚王国的一位王者。反山出土玉器中有近百件雕琢了精细的纹样，以 M12 的权杖、大玉琮、大玉钺、柱形器和 M22 的大玉璜上的神人兽面纹最为突出。共有完整神徽 18 幅，占反山王陵总数的四分之三强。这种完整的神人与兽面复合的图像，为解读良渚玉器上或简或繁、可分可合的类似纹饰提供了可资对应的依据，减地浅浮雕和阴线微雕相结合的工艺，充分显示了良渚玉器高超的琢玉水平。反山王陵的墓主人们拥有代表神权的琮，象征军事指挥权的钺，体现财富的璧，以及装饰在冠帽、佩挂穿缀在衣物上的各种特殊玉饰件，充分显示了他们是凌驾于部族平民之上的显贵阶层。神人兽面像集中反映了良渚社会生活中神的威严和神圣，既是以玉事神的巫觋们上天入地功能的写照，也是良渚部族尊崇的“神徽”³。

反山王陵以南的姜家山遗址，发现了良渚贵族墓葬 14 座。姜家山墓地以南的桑树头遗址，也曾出土过玉琮等玉器。推测莫角山宫殿区以西的土岗上自北向南分布有反山、姜家山和桑树头等王陵和贵族墓地。

瑶山祭坛和墓葬复合遗址，位于良渚古城东北约 5 千米，是良渚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瑶山遗址依托一座海拔约 35 米的自然山丘修整营建而成。1987 年、1996 年至 1998 年和 2017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瑶山进行了发掘和补充清理，揭露遗迹面积逾 5000 平方米，祭坛北、西、南三面基本从山脚起筑，东与自然山体连接，整个祭坛遗迹呈西低东高之势。在堆筑过程中因山体往西、北的自然倾斜而采用不同方向的条状石坎和护坡，形成不同高差的台面。南、北边缘存在明显的陡坡，与中心区域形成高达 9 米的落差，中心区域的恢宏气势彰显无遗。中心区域处在祭坛的东北，为三重土色回字形遗迹，中间为大致呈方形的红色土，也是山体的自然土，周围开挖平面呈回字形的沟，填埋灰色土，周围为黄土铺成的平整台面，局部尚残留砾石的铺面。中心区域之外的祭坛平面基本上呈漫坡状。

13 座良渚文化权贵墓葬打破中心区域堆积，其中 M12 是核心墓葬。随葬品以玉器为主，还有嵌玉漆器，以及陶器、石器等。随葬器物编号 755 件（组），以单件计共 2537 件。其中玉器为主要随葬器物，共出土玉器编号 679 件（组），以单件计 2459 件。全部墓葬分成东西向的南北两行排列，南行墓列玉器组合为玉冠状器、带盖柱形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钺、小琮及石钺。北行墓列玉器组合为玉冠状器、璜、圆牌和纺轮。根据玉器组合推断，南北行的死者分别为男性和女性。根据墓葬随葬陶器形制和玉器形态特征判断，瑶山遗址营建时间为良渚文化早期，约公元前 3300 年。瑶山遗址中心区域的西部，还曾

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执笔：王明达），《文物》1988 年第 10 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 年。

出土有琮等重器,可知遗址在其后还历经多次营建和拓展过程⁴。

反山、瑶山主体年代属于良渚文化早期,瑶山的起始年代要早于反山,从出土玉器的形制和纹样分析,彼此有互为沟通的实例,虽然目前还不能完全明确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完全确认核心墓葬之外其余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但是从使用玉料的材质、种类和刻纹看,良渚遗址内权贵阶层关系密切、玉器生产活动的集中性非常鲜明,是内向的辐射式文明的物质层面的最突出表现⁵。

二

反山、瑶山发掘在良渚文化田野考古操作方面取得了重要收获,不仅在墓葬考古上,而且在遗址堆积过程和整体格局上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与以往发掘墓葬不同,是将整个墓地作为聚落遗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对待,从解剖良渚遗址群的剖面着眼,从墓地的营造、各墓之排列及其相互关系、墓坑与墓内已腐朽棺槨葬具之关系、墓内随葬品的分布及其组合组装配伍关系、墓地与环境及诸遗址的关系诸方面加以综合考察⁶。

第一,棺槨制度的认识。尽管木质葬具已经朽烂,葬具也已经倒塌压扁,但是,通过野外精心观察和揭示,发现墓底筑有凹弧状棺床的低土台,随葬品从两侧向中部倾倒,还有部分器物因撞击而破碎的现象,说明墓内原来有凹弧底的棺木。一些特殊玉器早于其他随葬品露头,高差距离达十余厘米,推测原先置放在棺盖上。少数墓葬在棺床的外侧,还局部剥剔出板灰痕迹,一些原先在棺盖上的柱形器陷入这一外侧的空间内,说明还存在槨室,这些推断在后来的良渚文化墓葬发掘中都得到了印证。

长江下游和海岱地区最早使用棺槨制度,早在崧泽文化晚期就开始在环太湖平原出现。桐乡普安桥遗址崧泽文化晚期显贵大墓中多例发现使用棺槨葬具,木槨无底,以板材插在棺侧围成箱式,有的槨板侧有类似柱洞的痕迹,或者是固定槨板的一种方式,木槨平面多呈井字形,保存棺槨痕迹较好的 M8 还发现了纯净的黄色封土⁷。棺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地位、权力和身份的象征物,也是埋葬礼仪制度出现的新变化。

第二,玉器组装、穿缀等配伍关系的确认。由于野外分层精心剥剔,在玉器组装、穿缀等配伍关系上取得了新认识。玉钺杖的完整复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虽然木质柄已腐朽不存,但经过精心剥剔,发现了镶嵌在柄上的小玉粒,确认了钺上端的玉质冠饰(瑁)和柄尾端的玉质端饰(徽),玉钺的全貌得以了解(反山简报)。反山 M12、M14 在起取登记时即明确定名为“玉钺杖首”、“觥形玉杖首”、“徽”,反山 M14 玉钺杖的柄镶嵌大量玉粒,野外不但绘制了原大的图纸,而且根据出土状况,把镶嵌的玉粒黏附在米格纸上原样保存了下来。瑶山出土成组圆牌数量最为丰富,出土时直排成列,并与墓室中部的玉璜相连(瑶山简报),为原始组佩的复原提供了第一手野外资料⁸。

第三,根据出土状况和形制对一批玉器进行了重新命名。除了玉钺杖的冠饰(瑁)、端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执笔:芮国耀),《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5. 秦岭:《良渚遗址的学术价值和遗产价值》,《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第31页。

6. 牟永抗:《浙江良渚考古又十年》,《东南文化》1997年第1期。

7.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上智大学联合考古队:《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

8. 芮国耀:《良渚玉璜再探讨》,《东方博物》第二十七辑,中国书店,2008年。

饰(徽),如:冠状器,之前有“倒梯形玉佩”、“垂幛形玉佩”等多种称谓,认为有孔可以系挂作为佩饰。反山、瑶山的发掘,明确这类玉器都位于头部附近,与人体佩饰不符,瑶山 M2:1 的短棒两面留有朱砂涂层,推断这类玉器是以下端的扁短棒插在某种有机质实体的顶端,神徽图像上尖顶大羽冠的确认,知此类器物上端多雕琢成冠顶状,整件器物外形恰如一顶冠帽,遂重新命名为“冠状玉饰”(冠状器)⁹。柱形器是根据体形新命名的玉器,其基本上都是圆柱状,中部有竖向贯通的小孔。反山发掘发现多例墓葬中 3 件一组的柱形器出土有一定的规律。反山 M20 的 3 件,以等距离分布在墓室的中轴线上;出土时明显高出墓内其他器物;反山 M23 的 3 件一组柱形器,其中两件滚落在右侧椁室内。带盖柱形器均一一套位于墓室的南端,位置往往比其他器物略高,可能是棺盖前端的附件¹⁰。

第四,神人兽面像(神徽)的发现,明确了过去良渚玉器上所谓的“兽面纹”实际上就是神人兽面像的简化形式¹¹。这种图像,可以解释为一位头戴羽冠的英俊战神,其胸腹部位隐藏在兽面盾之后,做冲击前跳跃动作。另外一种解释是兽神的人形化,既可视作在兽面的表象里包含着人形的精灵,或是兽的精灵已具有人的形状。这种图像在良渚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还表现在它广泛地施刻在各种玉器上。琮、钺、璜、三叉形器、锥形器、冠状器、半圆形器、带钩及器柄等,都有它的踪迹,几乎遍及除玉璧之外的所有个体较大的器种上,其中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则莫过于琮和冠状器,所有良渚文化的玉琮,无一不刻这种简化的图像¹²。

龙首纹玉器也是反山、瑶山发掘的新确认。反山 M22 成组圆牌首次出土,随后在瑶山北列墓葬中发现多例。瑶山 M1:30 镯形器,利用环身的宽平面和两外侧面,雕琢四个相同的龙首形装饰,整个图案由一个正视图和两边的侧视图构成立体画面,双目作半球形凸出于器表,额上阴刻三角形尖耳,鼻吻颇长,鼻梁上常饰菱形纹样,鼻翼刻在宽平的鼻端两侧,一排平齐的上列牙齿。细审图像各部,似为各种动物的结合图形,其形态与我国传统观念中的龙形颇为近似,以往称之为“蚩尤环”,遂重新命名为“龙首纹”。随着形制与红山文化玉雕龙甚为接近的单体玉龙的出土,又把之前笼统归属为“兽面纹”的以圆凸纹样为主要特征的玉管图案,重新确认为变体形式的龙首纹¹³。龙首纹不仅是兽面纹的另一种图案形式,而且与兽面纹存在着很大关系,从纹饰结构比较分析,兽面纹很有可能从龙首纹发展而来,或至少包含了龙首纹的元素¹⁴。

第五,嵌玉漆器是镶嵌件的重要内容之一。镶嵌件是指大量细小的无孔玉粒及某些捉手、圈足之类的玉件,它们往往与髹漆综合地装饰在有机质的器具上,既可称为漆器,也可认作镶嵌的玉器,开后世青铜器镶嵌的先河,它们的发现,大大提前了我国镶嵌工艺的历史。可辨的反山、瑶山嵌玉漆器,有瑶山 M9、反山 M22 的嵌玉漆觚、反山 M12 的翘流嵌玉漆壶,以及反山 M12、瑶山 M7 的嵌玉圆形器等。嵌玉漆器的出现将玉的覆盖面

9. 王明达:《良渚玉器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62页。

10. 王明达:《良渚文化若干玉器的研究——从反山20号墓谈良渚玉器的功能》,《东方博物》,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页。

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执笔:王明达),《文物》1988年第10期。

12. 牟永抗:《良渚玉器上神崇拜的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87、191页。

13. 刘斌:《良渚文化的龙首纹玉器》,《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311~313页。

14. 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研究》,《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的龙首纹与神人兽面纹之兽面纹》,《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

扩展到容器领域，成为商周时代以器表装饰凹凸不平的纹样为特征的青铜礼器中容器的直接前身之一，通过多种配伍方法，有效地克服了玉料及剖割技能的局限，使得个体较小的单体玉件，在空间上得到充分的伸展，从而达到神秘化、神圣化的社会意念¹⁵。

良渚玉器按形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器形源于生产工具的钺，崇拜、信仰等与神或神权有关的专用器，琮是最大的代表；特殊礼仪有关的服饰、用具，如冠状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等。它们共同反映了玉器的神圣化和神秘化，其中玉钺是礼制出现的指示器，成组玉礼器的出现标识着一种礼仪制度——礼制的开始¹⁶。

三

反山、瑶山发掘后不久，1989年，江浙沪的考古学家联合编辑出版了《良渚文化玉器》大型图录，收录了三地出土的良渚玉器239件（组），在前言中对良渚玉器发现和研究的学术史、琢玉工艺、功能，以及良渚玉器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¹⁷。2011年，良渚博物院编著的《瑶琨美玉——良渚博物院藏良渚文化玉器精粹》，在前言中回顾了良渚文化玉器的金石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强调了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性及今后研究任重而道远。以良渚博物院藏200余件良渚玉器为主，从工艺技术研究角度，通过微痕分析和近红外光谱的技术手段进行介绍。2015年4~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余杭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以反山M20葬仪为引子，展现良渚古城结构和秩序中的权力与空间、权力与等级、权力与性别、权力与资源，以及以玉事神所反映的良渚社会的统一信仰¹⁸。

反山、瑶山出土的玉器品质上乘、数量丰富、种类齐全、雕琢精美，是良渚文化中心良渚古城和周边区域中心的一整套用玉礼制的反映，更是良渚文化分布区用玉礼制的代表。本图录选录反山、瑶山出土玉器一百余件（组），为了叙述方便，根据玉器功能分为六类：葬具上的礼仪用玉、反映神权的琮和衍生的琮式玉器、反映王权的玉钺和其他权杖、发展为财富观念的璧、礼仪服饰用玉、礼仪工具用玉。

1. 葬具上的礼仪用玉

主要包括置放在棺盖上的3件一组的柱形器、镯形器，以及带盖柱形器等。

2006年良渚安溪后杨村M4，独木棺盖板和底板形状保存完整，弧形盖板受重压开裂塌陷，3件琮式柱形器置放在盖板的前、中、后端，是迄今所见良渚大墓中成组柱形器原始置放状态最清晰的墓例，佐证了反山发掘时的判断¹⁹。

瑶山M7是出土镯形器最多的墓葬，达12件，除了作为臂穿的镯形器等，M7：6、M7：57和M7：58镯形器形制接近，内径明显小于作为臂穿的镯形器，出土时等距离分布于墓室的两端和中部。M7：57断裂为6块，位于墓室的一侧，显然原先这3件也是置

15. 牟永抗：《良渚玉器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牟永抗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76页。

16. 牟永抗、吴汝祚：《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69、170页。

1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90年。

1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良渚博物院、杭州市余杭博物馆：《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

19. 王宁远：《良渚遗址群后杨村遗址》，《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放在棺盖上，其中 1 件为葬具倒塌后滚落到椁室。

瑶山 M1：30 龙首镯，出土时高于墓底约 20 厘米，原先应该也是置放在棺盖上。

带盖柱形器仅出土于良渚遗址群的大墓中，除了瑶山 M11 之外，均为男性显贵大墓。均出土于墓主的头端部位，瑶山 M9：1 带盖柱形器出土时盖部位于柱形器之下，柱体的图纹正置。带盖柱形器通过盖背面的隧孔和柱体的贯孔串系，可能作为特别的棺饰。

2. 反映神权的琮和衍生的琮式玉器

琮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在所有良渚玉器上，自始至终能够完整反映图案化的神人兽面像序列的，只有琮，显示了琮和神人兽面像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神像是构成琮的核心因素，是琮的灵魂²⁰。良渚琮主要分为外形近似环镯的镯式圆琮、四角节面凸起明显的矮方琮、高体型的多节琮三类。良渚文化琮的功能较为复杂，有的作为臂穿佩戴，有的放置于头侧等特别位置，有的放置于肢体旁，甚至还有作为特别的器座，插放豪华权杖，等等。良渚琮的基本形制和要素包括圆形的外廓、四角、分割四角的直槽、中间贯穿的射孔，以及四角以整体展开法展示的神像图案。所有的良渚玉琮，都刻意雕琢为上大下小的形制，这也是仰视所需的视角。如果对良渚琮进行解构，把琮上下的圆视为天地，把贯穿上下的射孔视为通道和主柱，把连接琮上下的节面和直槽视为方位和通道，那么这一复杂几何形式的立体，很可能是当时天地宇宙观的象征。良渚玉器的源头之一，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凌家滩文化中，凌家滩 87M4：30 刻纹玉版的图案，与琮仰视后的展开示意，有着惊人的一致，似乎是琮的先行设计²¹。瑶山 M9 是迄今为止良渚遗址群中年代最早的显贵大墓，虽然出土琮为环镯形的镯式圆琮，但是多节面的小琮形制已经完全与矮方琮一致，说明很可能在良渚遗址群拉开良渚文明大幕伊始，琮的基本形制就已经一步到位设计好了。

反山、瑶山拥有琮的墓葬均为男性，数量和品质与墓葬等级密切相关，出土琮被视为神权的拥有。反山 M12 出土 6 件，被盗的瑶山 M12 计琮 7 件，两墓均有小射孔的大琮各一件。反山 M12：98 大琮位于墓主头部一侧。良渚文化晚期江苏武进寺墩 M3 墓主头端部位也出土有一件小射孔的大琮（M3：5），寺墩曾采集有这类大琮 3 件（寺：19、寺：24、寺：27）²²，可见作为良渚文化中心在用玉制度上对于周边区域中心的影响力。

除了单体的琮，琮的形式还被雕琢在锥形器、柱形器上，还有一类管状小型琮，称之为小琮或琮式管。琮也是良渚后续传播影响最广的玉器。

3. 反映王权的玉钺和其他权杖

根据对甲骨文和金文的分析，斧钺是“王”字的本形，因此，玉钺的拥有被认为是军事统帅的象征，作为王权的代表。长江下游地区穿孔石斧（钺）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马家浜文化时期，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三星村文化类型”）出土了两套组装骨质瑁瑁的豪华

20. 刘斌：《良渚文化玉琮初探》，《文物》1990 年第 2 期。

21. 牟永抗：《关于琮璧功能的考古学观察——良渚古玉研究之一》，《东方博物》第四辑，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年。

22. 南京博物院：《1982 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 年第 2 期；陈丽华：《常州市博物馆收藏的良渚文化玉器》，《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 60 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中心，1996 年，第 66 页。

石钺,说明早在距今6000年前礼仪性的石钺就已经成为定制²³。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玉质的斧钺,良渚文化时期玉石钺成为男性性别的标识,不同材质和不同形制的石钺有等级之分,玉钺的有无以及是否组装玉质的瑁徽更成为身份等级和地位的象征。瑶山M7玉钺瑁徽的构形不仅是纵向对折的冠状器,还雕琢变体的羽线和神兽纹。反山M12大玉钺本体两面雕琢神像和神鸟,彰显了王权神授。

反山M12有一组豪华权杖的瑁徽(M12:91、M12:103),雕琢神像。2010年上海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良渚文化晚期M207,墓主两侧分别出土了一对象牙权杖,权杖主体雕琢10组神人兽面像,下端插入徽部,徽部雕琢两组神兽纹和神鸟纹,通长约79厘米,权杖上下端的基本形制与反山M12权杖玉瑁徽完全一致²⁴。与反山M12:91徽形制接近的还有瑶山M7:29徽,卯孔内底至底面也有小孔,只是权杖整体情况不明,与之配伍的端饰也还不太清楚。

除此,反山、瑶山还出土了其他各种形式的端饰,由于载体和配伍关系尚不能完全明确,暂时按照形制分为榫头、卯孔、贯孔、镶插等多种形式的端饰,一些端饰成对出土,一些端饰成组出土,一些墓葬之间的端饰存在形制上的共性,一些则是独一无二的。如反山M12:59、M14:85、M20:203、M23:4镶插端饰,形体扁平,端面有凹缺,均位于墓室的北端部位,显然具有很大的共性。

4. 发展为财富观念的璧

璧环类玉器出现较早,早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中就开始出现,尤其是凌家滩文化,有通过线镂形成的双重璧环、锯齿状璧环等多种形式,寓意对于太阳的崇拜和对天地的观察,只是那个阶段的璧环形体都较小,与良渚玉器中的成组“圆牌”形体较为接近。良渚文化璧的发展是从小型璧环向大孔璧环(所谓“瑗”),至最后定型的过程。瑶山主体年代属于良渚文化早期,这也是不出土典型良渚玉璧的原因所在。

反山是迄今出土璧数量最多的墓地,共130件,其中M23出土54件,是迄今为止出土玉璧数量最多的良渚墓葬。反山M20:186璧品质和工艺最为精美,璧的宽度(所谓“肉”)和璧的穿孔(所谓“好”)之比为3.6:1,成为良渚文化璧的黄金比例。良渚文化高等级墓葬中,品质较好、打磨比较精细的璧,出土的位置往往在墓主的上身部位。而那些制作稍粗糙的璧,往往呈堆叠状位于脚端部位。良渚璧一般受沁程度较轻,较多地保留着玉材的本色,可能与其含铁量较高有关,玉材品质一般。有考古学家推测其可能是“财富”的象征物,也是礼的内涵之一²⁵。

5. 礼仪服饰用玉

礼仪服饰用玉包括头饰、项饰、胸饰、臂穿、带钩和各种形式的穿缀玉器。头饰又包括冠状器以及仅男性显贵使用的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成组半圆形器等。项饰除了管串

23. 江苏省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

24. 上海博物馆:《上海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0期。

25. 王明达:《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初论》,《文物》1989年第12期。

和珠串，主要是女性显贵佩戴的璜、成组圆牌等各类原始组佩。各种形式的穿缀玉器种类繁多，有不同几何构形的穿缀玉器，也有鸟、蝉、鱼、龟等动物造型的穿缀玉器。

除了良渚文化早期少数冠状器顶部有平顶和半圆形，绝大多数的冠状器顶部和外形直接取之于神人兽面像的介字形冠帽。1999年浙江海盐周家浜 M30 冠状器卯销在象牙梳上，完全解决了冠状器的使用功能问题²⁶。反山 M16：4、M15：7 冠状器利用透雕和阴线刻划相结合的技法展现神人兽面像，其中 M15：7 冠状器的构形，顶部凸起呈台形，与良渚文化晚期玉器上的台形铭刻图符以及好川文化柄形器上的台形镶嵌玉片形制颇为接近，彼此应存在发展关系。

三叉形器通过端部的贯孔镶插簪体，与冠状器镶插在梳体一样，均作为墓主束发后的插件。三叉形器仅见于良渚遗址群及周边区域，至嘉兴地区渐渐阙如，不见于苏南、沪西的良渚文化分布区，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三叉形器的上端往往有一根玉管与之配伍，这样可使得中叉的长度大大延伸。已知配伍三叉形器的最长玉管是反山 M17：9，长达 12.48 厘米，与中叉组装后整器可高达 15.3 厘米。三叉形器形制独特，具体造型复杂。瑶山出土的刻纹三叉形器上，神人的冠冕或羽线被雕琢在三叉的上端，寓意鲜明。也有学者认为三叉形器的造型与玉鸟颇具神似之处²⁷。

锥形器的原型可能是源自箭镞和投矛，单体的锥形器在墓内出土位置多样，尾端常有玉套管配置。成组锥形器则均位于墓主头部。通过反山、瑶山的发掘，判断其放置方式似乎象征羽冠的羽毛，与三叉形器邻近或叠压，可能共同组成冠饰。成组锥形器主要分布于良渚遗址群及周边区域，多为奇数，其中一件形制较为特别，或颇长或雕琢琮式图案，为男性显贵墓葬专有，一组 11、9、7、5、3 件不等，等级鲜明。良渚庙前 M4 一组 3 件锥形器的下方有宽长状的涂朱骨痕²⁸，极有可能原先卯销在宽长状的有机质（骨）载体上作为冠饰，与嘉兴地区良渚文化时期高等级墓葬中墓主佩戴成组猪獠牙冠饰的形式接近。

成组半圆形器一组 4 件，正面弧凸，背面凹弧且有缝缀隧孔，出土时呈圆周状分布于墓主的头部，推测原先应该缝缀在皮革类的载体上，作为头饰。成组半圆形器目前仅见于反山、瑶山墓地等级最高的墓葬。

以璜、成组圆牌为主体的组佩为女性显贵专有，分为颈饰和胸饰。璜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六七千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条形璜，其产生原因可能与玦的形制和工艺有关²⁹。五六千年前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是璜的繁荣期，良渚文化早期出现半璧形大璜。瑶山 M11 墓主颈部出土 3 件璜，其中 M11：94 桥形龙首璜两组管串与之配伍，M11：83、84 大璜也可能附系在管串上。瑶山 M11 也是成组圆牌出土数量最多的墓葬，总计 12 件，它们极有可能为两列 8 件圆牌串系大璜，然后再纵向系挂 4 件圆牌，已颇具周代组佩的架势。良渚文化中晚期，随着男性威权地位的绝对确立，璜和成组圆牌迅速退出良渚玉器的舞台。

26. 蒋卫东、李林：《海盐周家浜遗址抢救性发掘获硕果》，《中国文物报》1999年11月17日。

27. 刘斌：《关于良渚玉器分类与定名的几点认识》，《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1页。

2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图版五二、图版五三。

29. 刘斌、王炜林：《从玉器的角度观察文化与历史的嬗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六辑：第二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臂穿分为腕饰和臂饰，主要为环镯形，其中还有管珠串等链状臂饰和腕饰。反山、瑶山未发现壁环状的臂穿，除了少量条状外，多为筒形。臂穿以管钻取形，仅发现不做臂穿用的瑶山 M11：58、41 镯形器内穿为线镂而成。管钻取形本来应该是弧凸的外壁，但筒形臂穿的外壁还微微内凹。良渚玉器外廓内凹还见于各类端饰、冠状器两侧边、玉钺两侧边等，应具有形体和视觉观看上的特别要求。

带钩数量不多，形体与后世带钩如出一辙。带钩的出土位置多在墓主下肢部位，不一定都做腰部带扣用。

反山、瑶山还出土有不少特有的各种形式的穿缀玉器，除了鸟、蝉、龟、鱼等动物造型，还有月牙形、椭圆形、半管形等特殊造型。管珠件的穿系，除了简单的串联，还有并联的。

6. 礼仪工具用玉

反山、瑶山出土玉器中还有一些是源自于工具和日常用品的玉器具，如纺轮、织机、刀柄、把手，以及嵌玉器具、匕匙食具等，一些器具上还雕琢神像。实用器具的玉礼化，也是良渚用玉制度的重要内容。反山 M12：68 嵌玉圆形器甚为特殊，复原外径约 28 厘米，中间为圆形大玉片，正面弧凸，背面平整，外周分别镶嵌光芒形、梅花形的玉粒，外廓呈凸棱状，同类器还有反山 M22：2、瑶山 M7：155，颇似“太阳盘”。

四

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基因之一，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是中华玉文化的重要代表，良渚文化玉器在中国史前玉器中独树一帜，是史前玉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体现良渚文明的重要因素。良渚国王和权贵通过一整套标识身份的成组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制度，达到对神权的控制，从而完成对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垄断，以大量玉礼器随葬的良渚文化大墓，集中体现了王者的高贵以及男女贵族的分工，良渚文化所创造的玉礼器系统以及君权神授的统治理念，也被后世的中华文明吸收与发展³⁰。

30. 刘斌、王宁远、陈明辉、朱叶菲：
《良渚：神王之国》，《中国文化遗产》
2017 年第 3 期。



I 神像的完形和变化



完整的神人兽面像即神徽，集中地出土于良渚遗址的反山和瑶山两个显贵墓地，计 26 幅。反山 23 幅，其中仅 M12 就有 18 幅之多，8 幅为 M12 : 98 琮王所有。瑶山 3 件玉器上共 3 幅。上海福泉山吴家场墓地的 M207 出有 10 组刻于象牙权杖，其余遗址不见。

I-1 / 神 像

神徽上部为神人，下部为神兽。神人头戴巨大的介字形羽冠，倒梯形面部，平臂弯肘，神兽重圈大眼、阔鼻，下肢作蹲踞状，鸟形爪。其中，神人羽冠、脸部和神兽的眼部、鼻梁、鼻部、阔嘴均减地凸起。神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灵魂，在整个环太湖地区表现得极为一致，贯穿了良渚文化的始终，是信仰统一的象征。鸟作为可以飞翔的灵禽，在构图中常常居于神像的两侧或下部。鸟纹的身体与神兽的大眼也完全一致，表明了二者的密切联系。